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普列汉诺夫

一

已故的卡勃利茨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写了《理性与感情是进步的因素》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引用斯宾塞的言论，硬说在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性只起着次要的并且完全是从属性的作用。有位“可敬的社会学家”反驳卡勃利茨时，对这种轻视理性的理论表示了含有讥嘲意味的惊异。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为理性作辩护，当然是正确的。但他如果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实质，而单只指明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如何不可以和不容许，那他就较正确多了。事实上，“因素”论本身就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随便挑出社会生活中的几个方面来，将它们看着独立的实体，变成是从各个不同方面并以不同的功效引导社会人类走向进步的一种特殊力量。这个理论在卡勃利茨那里所具有的形式，尤其没有根据，因为他不是把社会人类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识的不同的领域说成为社会学的特殊的实体。这真是绝顶的抽象；无法再前进一步，因为再进一步就会走进显然妄诞无稽的境界。这才是“可敬的社会学家”应该叫卡勃利茨及其读者们注意的地方。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发现卡勃利茨因极力探寻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而走进了怎样一种抽象的迷宫时，也许会在无意中对因素论本身做出一点批评吧。而这在当时对于我们大家都会是很有益处的。但他却没有胜任。原来他自己也

是站在这一理论的观点上，他与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具有折衷主义的倾向，所以在他看来，一切“因素”都同样重要。后来，在他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言论中，他的头脑中的折衷主义本性更是表现得特别明显，竟以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并根本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种学说。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连想都没有想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因素”论是毫不相干的。所以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才会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替所谓无为主义作辩护的。不过，应该指出，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的这种落空丝毫也不新奇；过去有，现在有，并且大概将来很长一个时期也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会这样落空的……

当唯物主义者还没有制定出对自然和历史的辩证观的时候，早已就有人责备他们倾向于“无为主义”了。我们且不去追溯“往古”，只消提一提英国一位著名学者普利斯特列同普莱士进行的争论。普莱士在评论普利斯特列的学说时，硬说唯物主义取消了个人的任何独立性。当时普利斯特列曾援引日常经验来回答过他。他写道：“我不来讲我自己，虽然谁也不能说我是一切动物中最不活动最无生机的；但我要问问你：你在哪里找得到比必然论的继承者更富于追求最主要目标的思考力、积极性、力量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人呢？”普利斯特列说这话时，是指宗教民主派，即指当时所谓必然主义者基督教派而言。我们不知道这个教派是否真像属于该派的普利斯特列所认为的那样积极。但这点并不重要。毫无疑义，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看法是完全能与最坚毅的实际活动相容的。朗松说道，“所有一切向人类一直

提出最大要求的学说，都在原则上认定意志没有力量，这些学说否认自由而使世界服从宿命论”。朗松认为凡属否认所谓意志自由的观点都会走到宿命论，这是不正确的；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看出一件极其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其实历史告诉我们，甚至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坚毅的实际行动，而且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还是这种行动的一种心理上的必要基础。例如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表现过更大的毅力，又如默罕默德信徒在很短一个时期内就征服了从印度起至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若认为我们只要一确信一系列的事变必然到来，我们就失去了促进或者阻挠这些事变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那就特错大错了。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为必然事变链条中必要的一环。如果是的话，那我的犹豫就会更少，我的行动也就会更加坚决。这是毫不足怪的：当我们说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链条中必要的一环的时候，那就是说缺乏意志自由在他看来是等于完全不能无所作为，这种缺乏意志自由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就是认为不能不如他所做的那样去做。这便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站在这个地位上，也就不能不这样做”]来表示的一种心理，由于这种心理，人们就会表现出简直不可遏止的毅力，作出绝顶惊人的丰功伟业。哈姆雷特根本不懂得这种心理，所以他只能唉声叹气。因此，哈姆雷特也就始终不能容忍那种认为自由是被意识到了的必然性的哲学。费希特说的对：“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二

我国有些人听信了什塔姆列尔的意见，以为西欧有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似乎含有不可解决的矛盾。我们所指的就是他的关于月蚀的例证。其实这一例证是再无聊没有了。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中，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也不包括在内并且也不可能包括在内。单就这点来看，已可知道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产生出一个促进月蚀的政党。然而，即使人的活动也包括在上述条件之中，那末，凡属很想看见月蚀而同时又确信月蚀这种现象不用他们促进也必然会发生的人，也是不会加入月蚀党的。在这种场合，他们的“无为主义”不过是拒绝那种无谓的即无益的行动，而与真正的无为主义毫不相干。为了使月蚀这个例证在我们所探讨的场合不再是一种毫无意思的例证，上面提到的那个党就得把这个例证完全改变过来。那时就必须设想月亮是个有意识的东西，它受蚀时在天空中所占的位置是其意志自决的结果，而这个位置不仅使它感到极大的快乐，并且是使它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所绝对必需的，因此它总是力求占据这个位置。作了这一切设想以后，应当自问一下：当月亮终于发现原来并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决定它在天空中的运动，反而是它的运动决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的时候，它又会作何感想呢？照什塔姆列尔的意见说来，如果月亮不用某种逻辑的矛盾来解脱这种窘境，这种发现就必然使它不能运动了。但是这种假定是毫无根据的。诚然，这样一种发现，也许会成为使月亮心情懊丧，使其精神失调，使其“理想”与机械的现实发生矛

盾的一种正式根据。但是我们既已假定“月亮的精神状态”归根到底完全是由它的运动来决定，那末我们也就应当在它的运动中去探求那些使它精神失调的原因。如果我们细心加以观察，那我们也许能看出，当月亮处在远地点时，它是以其意志不自由为憾的，而当它处在近地点时⁸，它却又会觉得这是使它精神爽健的新的正式根据了。也许结果恰巧相反：也许它不是在近地点，而是在远地点能找到使自由与必然互相融洽的办法。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互相融洽无疑是完全可能的；对必然性的认识是完全能同最坚毅的实际行动相容的。至少迄今历史上的情形常是如此。否认意志自由的人，往往比自己的所有同代人都有更坚强的意志，并且对于自己意志的要求也最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例子是人所共知的。显然，什塔姆列尔是忘记了这种例子，只有故意不愿意看见历史现实真相的人，才会如什塔姆列尔那样忘记这种例子。例如，我国主观主义者和德国某些庸人就是极不愿意看见历史现实真相的。但庸人和主观主义者并不是人，而是如别林斯基所说的一样，不过是些幻影罢了。

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一一过去的，现时的或将来的——行动完全带着必然性色彩的那种场合吧。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场合，一个人既如穆罕默德那样自认是替天行道的使者，或如拿破仑那样自认是不可逃避的天运所选定的人物，或如十九世纪的某些社会活动家那样自认是代表着历史运动的不可遏止的力量的人物，那他就会表现出几乎是自发的意志力量，把各县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在他的道路上所筑成的那一切障碍，象秋风扫落叶一样一扫而光。但这

种情形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现在还有另一方面，即如下一方面。当我认为我的意志不自由只是表明我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作的那样去作时，当我了解我的这种行动同时也是各种可能的行动中最合我的心愿的行动时，在我的意识中必然性是与自由同一的，自由是与必然性同一的，于是我不自由的意思就只在于我不能违反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不能使二者彼此对立，不能觉到我自己是受必然性所拘束。然而这样的缺乏自由，同时也正是自由的最充分的表现。

齐美尔说过，自由总是指摆脱什么东西而言，自由若不了解为与拘束相反，那自由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然是这样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种细微、粗浅的真理来推翻哲学思想所曾作出的一种最卓越的发现，即自由是已被认识到了的必然性这一原理。齐美尔所下的定义太狭隘了：这一定义仅仅是指不受外部拘束的那种自由而言。当所谈的只是这样的拘束时，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就是可笑已极的了：一个想从你的衣袋中偷去新手帕的小偷遇到你阻止他这样做，而他又还没有什么办法打破你这种抵抗的时候，当然是不能自由偷去你这个手帕的。但是除了这种粗浅的自由概念之外，还有一种深刻无比的自由概念。不能进行哲学思维的人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自由概念的，而且能够进行这种思维的人，也只有已经摆脱了二元论，并了解主体和客体间根本没有二元论者所设想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时，才能体会到这种自由概念。

俄国主观主义者用他们的乌托邦理想来同我国资本主义的现实相对立，并且不能超过这种对立一步。主观主义者陷进了二元论的泥

潭。那些所谓俄国“学生们”的理想，其近似资本主义现实的程度是比主观主义者的理想少得不可计量的。虽然如此，这些“学生们”毕竟找到了把理想与现实连接起来的桥梁。“学生们”的见解提升到一元论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进程而走向它本身的否定，因而走向使他们——俄国“学生们”，并且不只是俄国“学生们”——所怀抱的理想见诸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学生们”也就充当着这种必然性的一种工具，并且他们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因这种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特性，也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既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正是具有这种特性而不是具有别种特性，于是他们也就不仅充当实现必然性的工具，不仅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而且还热情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当这种工具。这就是自由的方面，而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起来的，更正确点说，这是和必然性同一的自由，这是变成了自由的必然性。这样的自由也是摆脱了某种拘束的自由；它也是与某种约束相对立的。深刻的定义并不推翻粗浅的定义，而是补充它们并把它们包括在自身中。那么，在这种场合，究竟还可谈到什么拘束，什么约束呢？显然，这里可以谈到的是足以使尚未摆脱二元论的人们的毅力受到阻碍的那种精神上的拘束，可以谈到的是不善于在把理想与现实分割开来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的人们所感到的苦恼的约束。当一个人还没有用哲学思想上的英勇努力争得这种自由时，他还不能完全享有自由，不能不因遇见那种与他对立的外部必然性而在精神上感到可耻的痛苦。可是当他一旦摆脱这种苦恼和可耻的拘束重压，而他的自由活

动已成为必然性的自觉和自由表现时，那他就会获得他从来所不知道的一种崭新的完美的生命了。那时，他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世上没什么东西能阻碍他，而且没有什么东西会阻住他如

天神雷电

轰击妖邪.....

三

再重复说一遍，对于某种现象的绝对必然性的认识，只会加强同情于此种现象并认为自己是引起此种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如果这样一个人认识了该现象的必然性以后却竟袖手旁观，而只是表明他不懂得算术而已。例如，我们假定说某种条件总和 S 具备时，现象 A 就必然要发生。你已经向我证明，这个总和中的一部分已经具备，另一部分到 T 时就会具备的。于是热烈同情于 A 现象的我确信了这点之后，便赞叹道：“妙极了！”说罢便躺下鼾睡起来，一直睡到你所预测的事变到来的那个吉日良辰为止。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是如下所述。在你的计算中，在现象 A 发生所必需的条件总和 S 中，本来是把我的活动也包括在内的，——假定这种活动是等于 a 。但因为我鼾睡去了，于是在 T 时所有促进这一现象到来的条件总和就不会是 S ，而是 $S - a$ ，这当然会使情况有所改变的。也许那时忽然有另一个人来替代我，此人本来也是近于无所作为的，不过幸亏他因看见我消极冷淡得太岂有此理而极感愤慨。在这种情形下，力量 a 就会由力量 b 所替代，而如果 a 等于 b ($a = b$)，那末促进现象 A 到来的条件总和

就仍然等于 S，而现象 A 也终究会在 T 时发生。

但是假如不能认为我的力量是等于零，假如我是个灵巧能干的工作者，假如没有什么人来替代我，那就不会有完整的总和 S，而现象 A 也就会发生得比我们所预料的迟些，或是不会发生得如象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完满，或是甚至完全不会发生。这是个明如白昼的道理，如果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以为在我背叛以后 S 仍然是 S，那只是因为我不计算而已。然而是否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计算呢？你曾向我预言过在 T 时一定会有总和 S，而你却没有料想到我同你谈话后就立刻跑去睡觉了；你竟确认我始终是个很好的工作者；你竟把不很可靠的力量看成了很可靠的力量。可见，你也计算得不好。但是，我们就假定你丝毫也没有弄错，而是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吧。那末你的计算就会是如下所述：你说在 T 时总和 S 就会具备的。这个条件总和中包括有一个负数，即我的背叛；同时这中间还包括有一个正数，即意志坚强的人因确信其意向和理想是客观必然性的主观表现而受到的那种鼓舞作用。在这种场合，总和 S 就会真正在你所预料的那个时刻具备，而现象 A 也就会发生。这大概是很明白的了。既然这很明白，那末究竟为什么我竟会因想念到现象 A 的必不可免而感到不安呢？为什么我会觉得这种必然性注定使我无所作为呢？为什么我谈论这种必然性时，竟会把最简单的算术法则忘记了呢？大概是因为我所受的那种教育养成了我这种极想无所作为的癖性，而我同你进行的谈话又使我这种劣根性一触即发。不过如此而已。对于必然性的认识在这里不过是成了我的精神萎靡不振借以暴露出来的诱因。要把它当作造成我

这种颓唐习性的原因^①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并不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而是在于我受到的那种教育。由此可见，——由此可见，——算术原来是一门非常可敬和十分有益的科学，它的法则甚至是哲学家先生，甚至特别是哲学家先生不应当忘记的哩。

若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对某种现象的发生不表同情，并设法加以阻挠，那末他对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的认识，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行为呢？这里的情形就有点不同了。这种认识很可能削弱他的反抗的力量。但是反对某种现象的人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信服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呢？这要到促成这种现象的条件已经很多而且很强大的时候。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们对于这一现象到来的必然性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力量的衰落，这都不过是促使该现象发生的种种条件强大有力的表现。这些表现也要算在促使该现象发生的有利条件之中。

然而，并不是所有反对该现象的人都会减弱其进行反抗的努力。其中有些人恰好会因认识到此一现象的必然性而加紧进行反抗，以至于拚命挣扎。在一般历史上，尤其是在俄国历史上有过不少表明这种拚命挣扎的大有教益的例子。这种例子想必读者自己也能够记忆起来，而无须我们来多费唇舌吧。

说到这里，卡列也夫先生就来打断我们的话，当然，他虽则不赞成我们对于自由与必然性的观点，并且不赞同我们偏袒意志坚强分子的“极端行为”的态度，但他终究怀着满意的心情在我们杂志上读到个人能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这种意见。这位可敬的教授高兴地叫喊道：“我向来都是这样说的呀！”这话倒也不错。卡列也夫先生以及所

有的主观主义者向来都认为个人在历史上有极大的作用。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他们因这样主张而博得一班先进青年方面很大的同情，这班青年极力想从事公益事业的高尚劳作，所以自然极为重视个人首创精神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主观主义者不仅始终没有解决，甚至没能正确提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他们把“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的活动跟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影响对立了起来，因而创造出了一种似乎新颖的因素论：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因素，这个运动本身的规律则是另一种因素。由此就得出了一种极不合理的观念，只有当那些积极的“个人”还专心致志于实际迫切问题，因而无暇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候，这种观念才勉强可以使人满意。而当八十年代到来的沉寂时期已使那些能够思考的人获得一种出乎心愿之外的闲暇功夫来从事哲学思考的时候，于是主观主义者的学说便显得破绽百出，甚至好象阿卡吉·阿卡吉也维奇那件鼎鼎大名的外套一样根本破烂了，无论怎样修补也补不成功了。于是能够思考的人就相继抛弃了主观主义这个分明全无根据的学说。但是，正如在此种场合常见的那样，这一学说所引起的反感竟使某些反对这一学说的人走到了另一极端。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过程，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为了尽量强调这种运动的规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了。他们把个人看成是不值得注意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性是和最狂热的主观主义者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能容许的。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

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与反题中间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观点。

四

这个课题们早就使我们感到兴趣，因此我们早已想请读者同我们一起来解决它。但是我们因有一些顾虑而没有这样作：我们以为我们的读者也许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课题，因而我们的提议未免太迟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种顾虑了。德国史学家使我们打消了这种顾虑。这是真情实话。原来最近一个时期在德国史学家中间发生了关于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激烈争论。有的认为伟人的政治活动是历史发展中主要的和几乎是唯一的原动力，而另一些人则断言这是一种片面观点，说历史科学不仅应当注意到伟人的活动和政治历史，并且要注意到全部历史生活(das Ganze desgechtlihen Lebens)。卡尔·兰普勒赫特就是后一派中的一分子，他著有《德国民族史》一书，此书已由尼古拉也夫先生译成了俄文。反对兰普勒赫特的人责备他主张“集产主义”，主张唯物主义，甚至把他——horribile dictu! [真是言之可怕!]——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无神论者”混为一谈，如他自己在争论结语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认识论他的观点以后，才知道人们加给这位可怜学者的种种罪名，都是毫无根据的。同时我们又知道了现代德国史学家没有能力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于是我们就认为自己有权

来设想，这个问题对于某些俄国读者来说至今也还是没有解决的，因而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也还可以说一点并非全无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话。

兰普勒赫特搜集了一大批(dneardgeSammlung, 象他自己说的)国家杰出人物对于自己的活动与其所处历史环境间的关系的见解;但他在争论中暂时还只援引过俾斯麦所发表的某些演说和意见。他引证了铁血宰相于 1869 年 4 月 16 日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所说的如下一段话:“诸位,我们既不能忽视已往的历史,也不能创造未来。有人常将自己的表针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就能把时间加快,但这实在是一种错误,我希望诸位加以避免。人们通常过分夸大了我对于我所依靠的那些事变的影响,可是毕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我来创造历史。即使我同诸位联合起来作这也是办不到的,虽说我们联合起来便能与全世界相抗。然而我们毕竟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应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我们把灯火放在果子下面,决不会使果子的成熟加速;而如果我们把尚未成熟的果子摘下来,是只会妨碍果子成长并使其腐坏的”。兰普勒赫特又根据若里所作记述引录了俾斯麦在普法战争时期说过多次的意见。这些意见大体上也还是说:“我们不能创造伟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适应事物的自然进程,应当只限于保证得到已经成熟的东西”。兰普勒赫特认为这是个深刻而完备的真理。在他看来,现代的历史学家只要善于探索事变的深处,而不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太短的一段时间中,就不会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麦能不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时代去呢?这是他在他权势最高的时候也做不到的。一般的历史条件,要比意志最坚强的个人更为强大。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

伟大人物是种“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

兰普勒赫特的意见就是如此，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万有史观。这个“万有史观”的弱点，是不难发现的。他所援引的俾斯麦的意见是很有趣味的一种心理证据。对于这位前德国宰相的活动尽可不表同情，可是决不能说他这种活动微不足道，决不能说俾斯麦是个带有“无为主义”色彩的人。拉萨尔论到俾斯麦的时候说过，“反动势力的仆役并不长于谈吐，但愿进步势力能多有一些这样的仆役”。这样一个有时表现出真正钢铁般意志的人竟也自认为在事物的自然进程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显然认为自己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工具而已；这件事实又一次证明，一个从必然性来观察现象的人，同时又可能是个意志很坚强的活动家哩。但也只有在这一点上，俾斯麦的意见才值得注意，若要用他这种意见来回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就绝对不行了。据俾斯麦所说，事变是自行造成的，我们只能保证得到事变所准备好了的东西。但是，每次“保证得到”的举动也是一种历史事变：这种事变与那些自行造成的事变究竟有何区别呢？其实，几乎每一次历史事变一方面既是“保证“某人得到先前发展过程中已经成熟的果实，同时又是准备未来果实的那些事变链条中的一环。试问怎能把“保证得到”的举动与事物的自然进程对立起来呢？显然俾斯麦是想说，在历史上活动的个人或集团从来不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万能的。这点当然丝毫也不容置疑。但我们还是想要知道：他们的力量——固然是远非万能的力量——究竟依什么为转移；这种力量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增长起来，在什么情况下又会减少下去呢。对于这些问题，

无论俾斯麦自己，亦无论那位援引俾斯麦言论的博学的“万有”史观的维护者，都没有给予回答。

诚然，我们在兰普勒赫特那里也可读到一些较为值得玩味的引证。例如，他从法国现代史学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莫诺的作品中引证如下一段话：“史学家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的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的表现，注重伟大的事变和伟大的人物，却不去描绘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这种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正是人类发展中真正重要而具有非暂时性质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在某种程度内可以归结为规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可加以精确分析的。其实，伟大事变和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两者是人类发展中各个时机的符号和象征。至于大多数所谓历史事变，则它们对于真正的历史，就好象海面的波浪对于来潮和退潮的深邃而经常的运动一样，它们在海面上发生，一时光彩灿烂夺目，随后一触着沙岸，就被击破而不留任何痕迹”。兰普勒赫特声明说，他对于莫诺这段话中每一句话都极表赞同。大家知道，德国学者不爱赞同法国学者，而法国学者也是不爱赞同德国学者的。因此，比利时史学家皮莱恩就在《Revue historique》(《历史评论》)上兴高采烈地强调了莫诺的历史观点与兰普勒赫特的历史观点这样吻合的事实。他说：“这样一种吻合极为重要，它显然证明未来是属于新的历史观点的”。

五

我们可不能对皮莱恩所抱的这样的愿望表示赞同。未来不可能属

于含糊暧昧的观点，而莫诺，尤其是兰普勒赫特的观点，却正是这样的观点。把研究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看作历史科学最重要的任务的学派，当然不能不受到欢迎。当这个学派在历史科学中最终巩固时，历史科学就会获得长足的进步。但是，第一，皮莱恩把这个学派当作新学派看待，这是错误的。历史科学中这一学派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产生了：基佐、米涅、古斯丹·梯叶里，以及后来的托克维尔等人，便是这个学派中卓越和一贯的代表人物。莫诺与兰普勒赫特的观点，不过是从一个陈旧然而颇为光辉的蓝本上摹印下来的一种模糊的摹本罢了。第二，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国史学家的观点在当时说来无论怎样深刻，但其中还有许多东西没弄清楚。在他们的观点中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没有给予一个确切圆满的回答。然而历史学家如果真要摆脱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片面观点，那末历史科学确实是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的。未来属于对这个问题也能给予一个最佳答案的学派的。

基佐、米涅以及该派其他史学家的观点是十八世纪的历史观点所引起的一种反应，是十八世纪的历史观点的反题。十八世纪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把一切都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活动。诚然，当时也有过一些越出一般常规的例外，例如，维科、孟德斯鸠或海德的哲学历史眼界，就要宽广得多。但我们现在所讲的并不是这种例外，至于十八世纪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却是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去观察历史的。就这方面来说，现在把例如马布利的历史著作重读一下，是很有趣味的。据马布利说，克里特岛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是由米诺斯一手造成

的，莱喀古士对于斯巴达的贡献也是如此。斯巴达人之“鄙弃”物质财富，正是应当归功于莱喀古士，因为他“深深钻进到同胞们的心坎里去压倒了爱财心理的萌芽”(descendit pour ainsi dire jusque dans le fond du coeur des citoyens etc.)。而斯巴达人后开离开英明的莱喀古士指点给他们的这条道路，却应归罪于莱山得，因为莱山得居然叫他们相信“新时代和新环境要求他们采取新规则和新政策”。用这种观点写成的作品，实在与科学很少相干，不过是专为引申出一些所谓道德“教训”而写述的一种教义罢了。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反对的正是这种观点。经过十八世纪末叶惊天动地的事变之后，已经绝不可能设想历史是某些较为杰出的人物或较为高尚开明的人物所一手做成的事情，以为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用某种情感和观念去训示那些没有知识而又唯命是听的民众了。况且，这种历史哲学又还激怒了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平民自尊心理。这里可以看出早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戏剧发生时期就已经表露出来的那种同样的情感。梯叶里在反对旧的历史观点时，又还运用过博马舍等人所提出来反对旧的审美观的那些论据。末了，法国不久前所经历过的风暴时期，又很明显地证明了历史事变的进程决非只是由人们自觉的行为所决定；单是这一情况已不免使人想到，此种事变是在一种隐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发势力那样盲目地而又依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作用着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实(虽然我们知道，这件事至今没有任何人指出过)是：把历史看作一个规律性过程的这种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极为彻底地发挥过了。例

如，米涅和梯也尔两人的著作就是如此。沙多勃利昂把新的历史学派称为宿命论派。他论述这个学派向研究者所提出的任务时说道：“这种学说要求历史学家论述最残忍的暴行时不表愤慨，说到最高尚的德行时不表爱戴，用冰冷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认为社会生活不过是不可抵抗的规律的表现，而由于这种规律，一切现象都正如它们所必然要发生的那样发生”。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并没有要求历史家持冷眼观察态度。奥古斯丹·梯叶里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过，政治热情磨炼着研究者的头脑，能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手段。所以只要稍微看看基佐、梯也尔或米涅的历史作品，就可知道他们热烈赞助过资产阶级对世俗贵族及宗教贵族进行的斗争，同样也赞助过资产阶级压制新兴无产阶级要求的企图。然而有一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即新历史学派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当时贵族已被资产阶级打败了，虽然它还企图恢复某些旧有的特权。在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所有一切议论中都反映出他们那个阶级以获胜自豪的意识。既然资产阶级从来未曾有过骑士气概，所以从它那些有学问的代表人物的议论中，往往可以窥见对待被战胜者的残忍态度。基佐在他的一本论战性的小册子中说过：“Le 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et cela est de droit”(“弱肉强食，理所当然”)。它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也是同样残忍的。这种残忍态度有时竟表现成为冷酷无情，因而就使沙多勃利昂发生误会。此外，究竟应该怎样来了解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当时还不明白。末了，新学派之所以会使人觉得它是个宿命论派，正是因为它力求坚持规律性的观点，而很少注意到伟大的历史人物。受过十八世纪

历史观念熏陶的人们当然是很难容忍这种观点的。所以，这些新历史学家也就受到各方面纷至沓来的反驳，因而发生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至今尚未结束的那种争论。

1826年1月，圣博甫在《Globe》（《地球》杂志）上论及当时出版的梯也尔所著《法国革命史》第五、第六两卷时写道：“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对事变行程添加一种意外的、变化无常的新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事变行程变更方向，但这种力量本身却由于其变化无常而令人无法测量。”

决不要以为圣博甫曾认定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似乎没有任何原因的。要是这样设想，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他只是认定，在社会生活中或多或少地起着重要作用的人们在智能上和精神上的特性，即才能，知识，坚决或犹豫，勇敢或胆怯等等，不能不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发生显著的影响，而这些特性又不能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它们永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叫做私人生活中的偶然现象的影响下形成的。我们且举几个例子来把这个显然不说自明的思想说明一下。

在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时期，法国军队获得过几次辉煌的胜利，法国当时显然能从奥地利方面获得现今比利时境内很大一部分领土的让步；但路易十五却并没有要求这种让步，因为他——据他自己说——并非以一个商人资格而是以一个国王资格进行战争的，所以亚琛和约也就使法国一无所得；但假如路易十五具有另外一种性格，或者换上另外一个国王，那末法国领土也许会扩大起来，而它的经济和政治

治发展进程也就会稍有不同了。

大家知道，法国进行七年战争时已经同奥地利结成联盟了。据说，这次联盟的缔结，彭帕杜尔夫人出力甚大，她深以骄傲的马丽亚—特列莎在写给她的信里称她做表妹或亲爱的女友(*bien bonne amie*)为幸。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严峻一点，或者如果他不是那样厉害地屈服于他那些宠妃的影响，那末彭帕杜尔夫人也就不会对事变进程起这样的作用，而事变也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其次，七年战争结果是于法国不利的：法军将领遭到过几次极可耻的失败。而且他们的举动根本就是异常奇怪的：黎塞留专干掳掠勾当，苏俾兹和布洛利两人经常互相掣肘。例如，当布洛利在维里豪尊一带对敌人实行攻击时，苏俾兹虽听见了炮声，但他却没有依照预先约定并且显然是他所应该作的那样去援助这位同僚，结果竟使布洛利不得不实行退却。而袒护这个极其庸碌无能的苏俾兹的仍是那位彭帕杜尔夫人。所以我们又可以说：假如路易十五不是如此好色成性，或者，假如他这位宠妃没有干预政事，那末事变的结果也许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的。

据法国历史学家说，当时法国根本不应该在欧洲大陆作战，而应该集中全力到海上去保卫法国的殖民地以免英国侵占。法国之所以没有这样去作，又是由于彭帕杜尔夫人的过失，因为她始终想她在那位“亲爱的女友”马丽亚—特列莎面前讨好。由于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丧失了最好的殖民地，而这对法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女人的虚荣心理在这里竟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因

素”。

还需要举出其他例子来说明么？那末就让我们再举一个也许是最鲜明不过的例子来说说吧。就在这个七年战争时期，1761年8月间，奥军在西里西亚同俄军汇合之后，把当时驻扎在施特里高一带的腓特烈的军队包围起来了。腓特烈处境危急万分，但联军却一再迁延攻击，而布图林将军在敌军面前停驻20日之后，甚至完全退出了西里西亚，只留下一部分军队去支援奥将牢敦。牢敦占领了距腓特烈军队据守地点很近的什维尼茨城，但这次胜利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若是布图林的性格坚决一点，那结果又会怎样呢？若是联军向腓特烈举行了攻击，使其无法筑垒固守，那结果又会怎样呢？也许联军会把腓特烈彻底击溃，使他不得不接受胜利者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不料经过几月后就发生了一次偶然事件，即俄国女皇伊丽莎白逝世，结果竟使局势一下子就变得大大有利于腓特烈了。试问：假如布图林比较坚决一点，或者说，假如当时担任指挥职务的不是他而是如苏沃洛夫那样的人，那结果又会怎样呢？

圣博甫批判“宿命论派”历史学家的观点时，还说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种意见。他在我们已经摘引过的那篇论米涅的《法国革命史》的文章中，认为决定了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的不仅有引起这次革命的一般原因，也不仅有这次革命反过来所激起的种种情欲，并且还有常被一般研究家忽略过去，甚至完全不能算作真正称为社会现象的许多细小现象。他写道：“当这些（一般）原因和（由它们所引起的）种种情欲发生作用的时候，自然界的物理和生理力量也不是无所作为

的：石头仍然受着重力的支配；血液也没有停止循环。假若米拉波未因偶患寒热病死去，假若罗伯斯庇尔忽然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或因患中风病死了；假若拿破仑中档殒命了，那末事变的进程难道不会有所变更吗？当我所假定的种种偶然事件充分具备时，事变的结局就会与你们所认为的不可避免的那种结局相反。而我假定出这类事件是有理由的，因为无论革命的一般原因或是这些原因所引起的那些情欲都不能排斥这类偶然事件。”接着，他又援引人所共知的意见，说要是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一点，历史进程也许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最后，他认为虽然可以说出许多理由为米涅的观点辩护，但他还是再次指出米涅错误的地方。他说，米涅把一切结果都归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殊不知这些结果同时也是由许多细小暧昧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成的；米涅的严谨的头脑，好像根本不愿意承认是所认为没含有一定秩序和规律性的那些现象存在。

六

圣博甫的这种异议，是不是站得住脚呢？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究竟有多少道理呢？为了确定有多少道理，我们首先就要把认为人能“用自己意志的突然决定”来给事变进程添进一种新力量而使其大大改变的这种意见考察一下。我们已经举出了我们认为极能说明这种意见的一些例子。现在我们来把这些例子仔细思索一下。

大家知道，当路易十五在位时代，法国的军事力量愈益衰落下去。

据昂立·马丁所说，在七年战争时期，法国军队始终都有许多妓女、商人和仆役跟着，军中辎重马匹要比乘骑马匹多两三倍，所以这个军队与其说是图伦和古斯塔夫—阿道尔夫那样的军队，不如说是大流士和薛西斯那样的乌合之众。阿恒荷尔茨在记载这次战争经过的著作中指出说，当时法军中被指定放哨的军官，往往随便离开哨所跑到邻近地方去跳舞，只有他们认为必要和方便的时候，才肯执行上司的命令。法国军中情形这样恶劣，是由于贵族阶层衰败，——但当时这个阶层仍然把持着军中一切高级职位，——以及迅速陷于毁灭的全部“旧秩序”普遍解体的缘故。单是这些一般原因，已经完全足够使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了。但是，苏俾兹一类将领的庸碌无能显然又使法军由一般原因决定的那种失利危险更加增多起来。既然苏俾兹的地位是全靠彭帕杜尔夫人来支持，那末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位贪求虚荣的夫人乃是大大加深了一般原因对法国在七年战争时期的情况不利影响的一个“因素”。

彭帕杜尔侯爵夫人之所以强而有力，并非由于她自己有什么力量，而是因为大权在握的国王听从她的意旨。能不能说路易十五的性格按照法国当时社会关系发展进程定应如此呢？不能这样说。在当时同样的发展进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个用别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圣博甫也许会说，这里只要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暧昧的生理原因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他这样说，那他说的就是正确的。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既然这种暧昧的生理原因影响到七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就影响到了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要是法国在七年战争中没有失去一大部分殖

民地，它的经济发展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哩。试问这个结论是否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概念相抵触呢？

不，丝毫不相抵触。尽管在上述场合个人的特点发生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罗斯巴哈会战后，法国人对庇护苏俾兹的那个女人极端愤慨。她每天都收到许多充满威胁和凌辱的匿名信。这十分强烈地使彭帕杜尔夫人焦急不安；她开始因失眠而痛苦。但她仍然继续支持苏俾兹。1762年，她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虽然责备苏俾兹有负对他的期望，同时却补充说：“不过您一点不必担心，我会关照您的利益，并且在国王面前竭力替您斡旋的。”可见，她并没有向舆论让步。究竟为什么没有让步呢？大概因为当时法国社会没有可能迫使她作出让步。为什么当时的法国社会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原来是当时的法国社会的组织妨碍这一点，而这种社会组织又是由当时法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决定的。由此可见，使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宠妃的癖性竟能对法国的命运发生这样一种悲惨影响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如果具有这种宠爱女人的弱点的不是国王本人，而是王室中某一个厨师或马夫，那么这种弱点就不会发生什么历史作用。可见，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弱点，而在于具有这种弱点的人所占的社会地位。读者当然懂得，这种论断对于上述其他一切例子也都是适用的。在运用这种论断的时候把应当改换的对象改换一下就行了，例如把法国换成俄国，把苏俾兹换成布图林，等等。因此我们也就不去重复了。

由此可见，个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点而能够影响到社会的命运。

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组织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地方、时候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个人影响的范围也与个人的才能有关系。是的，我们同意这种意见。但个人只有在社会上占有为此所必需的地位时，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为什么法国的命运竟能操在一个既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热心去替社会服务的人物手中呢？这是因为法国当时的社会组织就是如此。正是这种社会组织决定了某些贤明人物或庸碌分子在某某时候所能起的作用，因而也就能表现出所发生的社会影响。

然而如果个人的作用决定于社会的组织，那么受这种作用所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概念相矛盾呢？这种影响不仅不同这种概念相矛盾，而是这种概念一种最鲜明的证实。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受社会组织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的可能性，给所谓偶然性对各民族历史命运的影响敞开了大门。路易十五的好色是他的身体状况的必然结果。可是对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说来这种状况是偶然的。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身体状况对法国后来的命运并不是没有留下影响，它本身成了决定这种命运的一个原因。米拉波之死，当然完全是由合乎规律的病理过程所引起的。但这些过程的必然性则完全不是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是从这位著名演说家体质的某些个人特点中以及从他感染疾病

时所处的那些身体条件中产生的。在对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的关系上，这些特点和这些条件都是偶然的。而事实上米拉波之死影响了后来革命的进程，并且成了制约这一进程的原因之一。

在腓特烈二世只是由于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才逃出极端困难的处境的上述例证中，偶然原因的作用更加令人惊讶。布图尔林的任命甚至对俄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而言，在我们对偶然性一词所确定的意义上，也可能是偶然的，而对普鲁士的一般发展进程，它当然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并非没有可能假定，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从绝望的处境中救出了腓特烈。如果取代布图尔林的是苏沃洛夫，那么普鲁士历史的走向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可见，国家的命运有时也取决于可以称作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

黑格尔说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东西的成分。”在科学中我们只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这难道不排斥对现象的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么？不。偶然性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它只出现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汇点上。欧洲人出现在美洲，对于住在墨西哥和秘鲁的人说来是偶然现象，因为他们的出现不是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然而西欧人在中世纪末期为航海的强烈热情所支配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的势力轻易地战胜了土人的反抗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后果也不是偶然的；这些后果归根到底是由一方面被征服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另一方面征服者的经济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所决定的。而这些力量，正如它们的合力一样，都是完全能够成为

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的。

七年战争的种种偶然事件对后来普鲁士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些偶然事件发生在普鲁士历史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影响就会完全不是这样。偶然事件的后果在这里也是由一方面普鲁士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另一方面影响了普鲁士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决定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偶然性也丝毫不会妨碍对现象的科学研究。

现在我们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命运常常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然而这还没有完全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它。

圣伯夫以为，只要他所指的那一类细小暗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法国革命就会有跟我们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重大的错误。无论细小的心理原因和生理原因以怎样的奇巧错综形式结合起来，它们在任何场合都消除不了引起法国革命的伟大社会需要；而只要这些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革命运动在法国就不会停止。为了使法国革命运动有一种与实际发生的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须用相反的另一一些需要来取代这些需要；而这自然是细小原因的任何结合绝对办不到的。

法国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属性，而圣伯夫假定的细小原因只能植根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社会关系的最后原因在于生产力的状况。而生产力状况之依赖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也许仅仅在这些人物从事技术改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大小的意义上。圣伯夫所指的不

是这样的特点。而一切其他可能的特点都不会使个别人物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状况，从而也直接影响生产力所制约的那些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只要特定的经济关系适合特定的生产力状况，无论特定个人的特点是怎样的，他都不可能取消这种经济关系。然而人物的个性特点使他或多或少地适合于满足在特定经济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需要，或者适合于阻碍这种满足。18 世纪末法国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是用比较适合法国新经济制度的另一种政治设施来取代过时的政治设施。当时最著名和最有益的社会活动家正是那些能够比其他所有人更好地有助于满足这种最迫切的需要的人。比如说，米拉波、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是过早的死亡使米拉波离开了政治舞台，情况会怎样呢？立宪君主制的政党会更长久地保持很大的势力；它对共和派的抵抗因此会更加强有力。但也不过如此。任何米拉波当时都不可能阻止共和派的胜利。米拉波的力量整个地建立在人民对他的同情和信任的基础上，而人民是渴望共和的，因为朝廷顽固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使他们感到愤怒。一旦人民确认米拉波不同情他们的共和渴望，他们就会不再同情米拉波，那时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失去几乎一切影响，而后大概就会沦为他徒然竭力加以阻止的那个运动的牺牲品。关于罗伯斯庇尔大致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假定他在自己的党内是完全无可替代的力量。但他无论如何不是这个党的唯一力量。如果比方说 1793 年 1 月一块偶然掉下的砖头打死了他，那么他的位置自然会由别的什么人来取代，而且，即使这个别的人在一切意义上都比他差得多，事变仍然会按照罗伯斯庇尔在世时所走的那同

一个方向发展。譬如说吉伦特派大概在这个场合也避免不了失败；不过很可能罗伯斯庇尔的党略微早一点失去权力，这样我们现在就不会说热月反动，而会说花月、牧月或获月反动。也许有人会说，罗伯斯庇尔由于自己铁面无情的恐怖手段加速了、而不是延缓了他那个党的垮台。我们这里不去考察这个假设，而是把它当作似乎完全有根据的东西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必需假定罗伯斯庇尔的党的垮台不是发生在热月，而是果月、葡月或雾月。简言之，这个事件的发生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它终究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这个党所依靠的那个阶层的人民根本没有做好进行长期统治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谈不上跟在罗伯斯庇尔强有力的促进下曾经出现的那个局面“相反的”种种结果。

即使波拿巴比方说在阿尔科勒会战时中弹殒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他在意大利远征和其他远征中所完成的功业会由其他的将领们来完成。他们大概不会表现出像波拿巴那样的才能，也不会赢得这样的辉煌胜利。但法兰西共和国毕竟会在其当时的各次战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当时法国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至于雾月十八日及其对法国国内生活的影响，那么在这里，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结局，实质上大致也会同拿破仑在世时的情况一样。受到热月九日致命打击的共和制度已经是奄奄待毙了。督政府未能恢复摆脱了上层等级的统治的资产阶级现在最为渴望的秩序。为了恢复秩序，需要一支“宝剑”，像西耶斯说过的那样。起初人们以为，起有益的宝剑作用的是儒贝尔将军，而当他在诺维阵

亡以后，人们开始谈到莫罗，谈到麦克唐纳，谈到贝纳多特。开始谈论波拿巴已经是后来的事；而如果他像儒贝尔一样阵亡了，那么人们就根本不会想到他，而会把另外一支什么“剑”推上台。不言而喻，一个被事变推上独裁者职位的人，从自己方面说理应孜孜不倦地为权力而苦心经营，坚决排除和无情镇压阻挡他的前进的一切东西。波拿巴具有钢铁般的毅力。他不惜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除他以外当时也还有不少坚强能干贪图功名的利己主义者。他成功地占据的那个位置大概不会空着。假定另一位将军取得这个位置以后比拿破仑热爱和平一些，假定他没有使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自己，那样一来，他就会是死在土伊勒里宫，而不是死在圣赫勒拿岛上。那时波旁王族就根本回不了法国；对他们说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跟实际上得到的结果“相反的”。然而按其对法国整个国内生活说来，它跟实际的结果区别不大。“宝剑”在恢复了秩序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后，资产阶级很快就會对“宝剑”的军营习惯和专制行为感到讨厌。像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派运动就会开始，斗争就会逐渐地开始变得激烈起来，而既然“宝剑们”没有肯让步的特点，那么道德高尚的路易·菲力浦也许就不是在 1830 年而是在 1820 年或 1825 年坐上了自己那些温柔可爱的亲戚的王位。事变过程中所有这些变化，可能会部分地影响欧洲后来的政治生活，而通过政治生活还会影响欧洲后来的经济生活。但是革命运动的最后结局，在任何情况下终究不会同实际的结局“相反”。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种种特点，可以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和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它们不能改变事

变的总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别的力量决定的。

七

此外还要注意一点。我们在讨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几乎总是成为某种错觉的牺牲品，向读者指出这种错觉将是有益的。

拿破仑担任拯救社会秩序的“宝剑”角色以后，也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将军来担任这一角色，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能够像他那样或者几乎像他那样地扮演这种角色的。对刚毅的军事统治者的社会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社会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军事才能的人通向军事统治者职位的道路。社会组织的力量成了不利于其他有军事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发生我们所说的那种错觉。拿破仑的个人力量对我们说来是以极其夸大的形态出现的，因为我们把曾经推举并支持该力量的那整个社会力量都归到它身上去了。它似乎成了某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像它一样的其他力量都没有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且当有人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怎么样时，我们的想象就混乱起来，我们竟以为，没有他就根本不会发生他的力量 and 影响所凭借的那整个社会运动。

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一个人物的成功妨碍另一人物的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多。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没有摆脱上述错觉。当特定的社会形势在社会的精代表面前提出某些课题时，这些课题都会吸引有卓越智慧的人们的注意，直到他们成功地把课题解决为止。而一旦他们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注意就会转到另外的对象上去。A 这个才

俊之士一旦解决了课题 X，就会因此把才俊之士 B 的注意从这个已经解决的课题引向另一课题 Y。当有人问我们，如果 A 没有来得及解决课题 X 便去世了情况会怎么样时，我们竟以为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会中断。殊不知在 A 去世的情况下，B 或者 C 或者 D 会着手来解决这个课题，因此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仍然是完整的，尽管 A 过早地死去了。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凭借这种才能获得对事变进程的重大影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的才能应当使他成为比其他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拥有的不是自己的军事天才，而是贝多芬的音乐禀赋，那么他自然做不成皇帝。第二，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要阻碍具有恰恰是当时所需要和有益处的那种特点的人物的道路。如果旧制度在法国再维持 75 年，同一个拿破仑也许终身是一个不大知名的将军或上校波拿巴。在 1789 年，达武、德塞、马尔蒙和麦克唐纳都是少尉；贝纳多特是上士；奥什、马尔索、勒费弗尔、皮什格吕、内伊、马塞纳、缪拉、苏尔特都是士官；奥热罗是剑术教师；拉纳是染色工人；古维翁·圣西尔是演员；儒尔当是叫卖小贩；贝西埃尔是理发师；布律纳是排字工人；儒贝尔和朱诺都是法律系的大学生；克莱贝尔是建筑师；莫蒂埃直到革命发生时都没有在军中服役。

如果旧制度继续存在到今天，那么我们中间现在谁也不会想到上世纪末法国有一些演员、排字工人、理发师、染色工人、法律系学生、叫卖小贩和剑术教师会是可能的军事天才哩。

斯丹达尔指出，一个与提香同时即在 1477 年出生的人，可以同 1520 年逝世的拉斐尔和 1519 年逝世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一起生活 40 年，他可以同 1534 年逝世的柯勒乔和活到 1563 年的米开朗琪罗一起度过很长的岁月，乔尔乔涅去世时他才不过 34 岁，他能够同丁托勒托、巴萨诺、韦罗内塞、朱利奥·罗马诺和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相识；一句话，除了属于整整 100 年后才出现的波伦亚画派的那些人以外，他是所有这些大画家的同时代人。同样也可以说，一个与沃弗尔曼同年出生的人可以跟几乎所有的荷兰大画家有亲身交往，而莎士比亚的一个同龄人则跟整整一批卓越的剧作家同时生活。

早就有人说过，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现实中出现的任何人才，即成为社会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才能的人们，正如我们说过的，所能改变的只是事变的个别外貌，而不是事变的总趋势；他们本身只是凭借这种趋势才存在；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从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不言而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泰纳说得对：“当文明发展中新的进步产生一种新的艺术时，围绕着把社会思想完全表现出来的一两个天才，会出现只是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的几十个才俊之士。”如果某些跟意大利社会政治发展和精神发展一般进程没有联系的机械的或生理的原因，还在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童年时代就把他们杀害了，那么意大利的艺术就不会有那么完善，但它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发展的总趋势仍然会是一样的。拉斐尔、列奥纳

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趋势：他们只是这一趋势的最好的表达者。诚然，围绕着一个天才人物，通常会产生整整一个流派，而且他的门徒们会力求掌握他的方法，甚至细枝末节；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由于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早逝而留下的空白，会大大地影响它往后的历史中许多次要的特点。但是，只要意大利精神发展一般进程中没有因为任何一般原因而发生任何实质上的变化，这段历史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不过大家知道，量的差别最终会转化为质的差别。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所以在历史上也是正确的。如果各种情况的不利的凑合使得本来可以成为特定艺术流派的表现者的一些才俊之士一个接一个地突然离去，这个流派在艺术上就根本不会有多少出色的表现。然而这些人的过早亡故，只有在这一流派没有深厚到足以推举出新的俊才那种场合下才会妨碍这一流派在艺术上有所表现。而既然文学艺术中任何特定趋势的深度都要由该趋势对于它反映其趣味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意义，以及由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作用来决定，那么在这里，一切归根到底也就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力量的对比。

八

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就我们所指的意义来说，在这些事变的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这种进程的方向归根到底是由所谓的一般原因决定的，即事实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

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偶然的现象和著名人物的个人特点，比深藏的一般原因要显著得多。18 世纪的人很少想到这些一般原因，他们都是用历史活动家的自觉行为和“情欲”来说明历史。这一世纪的哲学家们断言，在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影响下，历史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说由于任何一个“原子”在任何一个统治者头脑中的胡作非为（《自然体系》中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见解）。

历史科学中新派别的拥护者们开始证明，尽管有不论什么样的“原子”，历史都不可能走与它实际走过的道路不同的路。他们力求尽可能鲜明地突出一般原因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历史活动家个人特点的意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事变丝毫不会因为一些人物被另一些能力或大或小的人所取代而有所变化。然而一旦我们接受这个假定，我们就必然要承认，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中一切都归结为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一般规律的作用。这是走极端，完全没有给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部分真理留下位置。然而正因为如此，相反的观点才继续为自己保留着存在的某种权利。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具有二律背反的形式，这个二律背反的第一项是一般的规律，第二项是个人的活动。从二律背反第二项的观点看来，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简单凑合；从它的第一项的观点看来，似乎甚至历史事变的个人特点也是为一般原因的作用所制约。然而如果事变的个人特点为一般原因的影响所制约，而不依赖于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性，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特点决定于一般原因，而且无论这些活动家怎样变换，它们都不可能改变。由此可见，这种理论具有宿命论的性质。

这一点没有逃过反对该理论的人们的注意。圣伯夫把米涅的历史观同波舒哀的历史观作了比较。波舒哀认为，历史事变赖其作用而发生的那种力量来自上天，它们是上帝意志的表现。米涅在人的情欲中寻找这种力量，这种情欲有如自然力量的不可遏止地和百折不回地表现在历史事变中。不过他们两人都把历史看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如此的那些现象所构成的一串连环；他们两人都是宿命论者；在这方面，哲学家与神父很近似。

只要社会现象和规律性的学说根本否认杰出的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对事变有影响，这种责备就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责备之所以尤其会产生强烈的印象，是因为新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像 18 世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最高主宰，历史运动的所有一般原因都是从它而来，并且听命于它。既然法国革命表明了，历史事变不是仅只为人民的自觉行为所制约，那么米涅、基佐和同一派别的其他学者们就把如此频繁地摆脱了任何意识控制的情欲的作用提到了首位。然而如果情欲是历史事变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那么，圣伯夫断言一旦出现一些活动家，能够使法国人民产生跟曾经使他们激动过的那些情欲相反的情欲，法国革命就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为什么不对呢？米涅会说：因为根据人性的属性本身，其他的情欲当时不可能使法国人激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许是真理。然而这个真理会具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因为它等于说人类历史按其全部细节都是由人的本性的一般属性所预先决定的。在这里宿命论是作为个别消融于一般的结果出现的。其实，它始终都是这种消融

的结果。有人说：“如果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这是对正确的思想的不正确的表述。应该说：如果一切都是通过一般完成的，那么个别，也包括我的个人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它被不正确地运用了。应用于现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它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个别的东西也是有地位的。而应用于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它却是有根据的。

现在已经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了：如果人的本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释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而如果它是变化的，那么显然，它的变化本身就为历史运动所制约。现在应当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一般原因同时起作用的有特殊原因，也就是特定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赖以进行而且本身最终是由其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即同一个一般原因所造成的那个历史环境。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于这些个别原因事变最终才获得自己的个别外貌。个别原因不可能使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作用制约着个别原因影响的方面和范围。然而毕竟无可怀疑的是，如果影响历史的个别原因为另一些个别原因所取代，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外貌。

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到现在为止都是立足于人性观点之上。拉姆

普雷希特斩钉截铁地和不止一次地声称，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心理是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由于这种错误，要考虑“社会生活全部总和”的那个本身很值得称赞的愿望，可能只会导致毫无内容甚至烦琐冗长的折中主义，或者——在最始终一贯的人那里——导致卡勃利茨之流所谓理智和情感孰重孰轻的议论。

不过且言归正传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的名著中称伟大人物为创始人（Beginner）。这是非常恰当的称呼。伟大人物正是创始人，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些，他的欲望比别人强烈些。他会解决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提上日程的科学课题；他会指出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他会发挥首倡精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英雄，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这是一种极巨大的意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什么是事变的这种自然进程呢？

俾斯麦说过，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当等待历史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谁来造成的呢？历史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的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社会的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即社会的关系。然而如果社会人在特定时期所创造的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这

种情况的发生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一状况的那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他徒然着手去拨动自己的钟表：他不会加快时光的流逝，也不会使时光倒退。在这里拉姆普雷希特是完全正确的：俾斯麦即使处在自己权势的巅峰时期，也不可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去。

社会关系中有自己的逻辑：当人们处于某种相互关系时，他们的感受、想法和行为就一定会这样，而不是别样。社会活动家开始进行反对这种逻辑的斗争也会是徒劳无益的：事物的自然进程（即社会关系的同一逻辑）会使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然而如果我知道社会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变化而朝哪个方面改变，那么我也就知道社会心理在朝哪个方向改变；所以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一心理。影响社会心理，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毕竟能够创造历史，而且我没有必要等待历史“自行造成”。

莫诺认为，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变和人物只有作为[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发展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这是正确的、不过表达得很不确切的思想，然而正是因为这是正确的思想，把伟大人物的活动同上述条件和设施的“缓慢运动”对立起来才是没有根据的。“经济条件”或多或少缓慢的变化会定期地使社会必然或多或少迅速地改造自己的设施。这样的改造从来都不是“自行”发生的——它始终都需要人们的干预，于是在人们面前就会产生伟大的社会课题。所谓伟大的活动家，也就是比其他的人更加有助于解决这些课题的人。而解决

课题并不意味着只是课题得到解决这种现象的“象征”和“符号”。

在我们看来，其实，莫诺之所以把两者对立起来，主要是因为“缓慢”这个令人愉快的字眼把他迷住了。许多现代进化论者都很喜爱这个字眼。在心理上这个偏爱容易理解的：它必然会在崇尚中庸和稳健……的善良人们中间产生。然而在逻辑上它却经不起批判，正如黑格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的那样。

不仅仅是那些“创始人”，不仅仅是那些“伟大”人物才有大显身手的广大活动场所。凡是愿用眼睛来看，愿用耳朵来听，愿拿一颗诚挚的心来爱护亲近人的人都拥有这种场所。“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从道义方面来说，每一个如圣经上所说愿意“为朋友舍命”的人都是伟大的。

全书完

注译： 1793 年秋，救国委员会为了进行一场闻所未闻的革命，别出心裁，以法国国民公会的名义颁行共和国年历，用以取代基督教历。改变日和月的名称，用旬代替星期。规定休息日不在星期日，而在每旬的第十天。新纪元始自共和国奠定之日，即 1792 年 9 月 22 日。一

年分 12 个月，每月各 30 天。从 9 月 22 日起，月份依以下顺序排列：葡月、雾月、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风月为冬季，芽月、花月、牧月为春季，获月、热月、果月为夏季。葡月为共和历第 1 月，下类推。每月三旬，每旬十天。每天按它在旬中的位分别定为第一、第二……第十来复日。另外有五天在一年之末，属于全年，称为“无套袜日”，第一日至第五日分别定为“才艺节”、“劳动节”、“行动节”，“报偿节”和“舆论节”。热月反动，指法国 1794 年 7 月 27 日（热月 9 日）反革命政变后形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局面。这次政变推翻了小资产阶级专政，并且把这个专政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